社会转型研究的分析框架问题

张 静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分析框架类似于形式逻辑的理想类型,是一项将关键要素关系理论化的努力,对社会转型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框架具有多元及竞争性,代表着流派传统,有多少分析框架,实际上就会有多少标准逻辑。这些逻辑往往影响着研究者对于具体事实的看法,在转型研究中起到发现事实、评估价值、提供标准、组织证据的作用。如果没有分析框架的帮助,很多差异特征之间的转型就会隐藏于历史视而不见。因为判断何者为转型的关键要素,并非是史料自动给出,而是由分析者从史料中选出。

关键词: 转型研究;分析框架;形式逻辑

中图分类号:C 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3-0157-07

一、历史观

社会转型一直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领域。由于转型的长程性质,政治社会学者多采用历史资料分析转型现象。一些观察称此为面向历史的"转向",但在我看来,这种"转向"其实指的是资料和证据的来源,而鲜少涉及处理史实的分析框架问题。与其说他们把研究目标转向历史,不如说他们在寻找对后致社会转型的路径影响更准确。另一些观察批评转型研究的"历史观"呈现断裂性——传统与现代,停滞与发展,野蛮与文明,国家与社会,……诸如此类,而非连续性,这确实触及分析框架,却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观"问题。

何为历史观?我的看法,它不是指将研究目标限定为历史。历史观属于前提性预设,是无论采用什么分析框架、无论分析历史还是现今材料的学者都须拥有的。如果一个研究者预设了——存在变动的进程事实,这些事实呈现不同的类型,可以进行认识和比较;在某些研究目的下,比如挖掘现今事实的起源,它们可以作为参照系提供经验或者教训——就可以说是具备了历史观。历史观给予研究者纵向及横向的比较视野,如果看不见历史的变动性及相互影响性,就未必可称得上具有历史观。即使是处理当今的事实,如果充分注意到了来自历史(纵向的自我历史,以及横向的他者历史)的影响,特别是相较于这些历史事实的新变动,明了现今事实在这些历史局势中的位置,就是具有历史观的体现。历史观具有的纵横比较视野,有助于克服转型分析中常见的局限:仅仅基于局部的已知经验,或者仅仅基于审美、好恶及教化目标的关于过去的评断。对于转型研究来说,历史观不是指如何看待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指是否具备了上述前提性预设。

如何看待具体的历史事实,常常是分析框架问题。比如学界常言的线性或者多元的"历史观",实际上是趋同演进还是趋异分殊的分析框架使然。我主张轻易不言分析框架的"转向",原因在于分析框架的形成代表着接续某种学术传统,它们本身就是多样的、竞争性的、相互影响或者挑战的。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有些影响大,较为"主流",有些影响较小,未引起注意。但主流的未必就是持久的方向,非主流也可能会慢慢变成主流,或者经过一段时间,再变成非主流……所以,分析框架并不是追求理论时髦。

分析框架不是权威竖立,而是认识者通过思

收稿日期:2019-01-31

作者简介:张静,女,北京市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想市场进行选择的结果。知识的进展,有赖于不同分析框架的交流甚至激战,它们的交汇、论辩、甚至抵牾,是为研究的常规现象。流的多元其实就是分析框架的多元,流的变化其实就是分析框架的变化,知识是在多元分析框架的竞争中,通过相互影响及不断的证据挖掘演变的。但演变不同于演进。如果知识(只能)“演进”,“转向”说法就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正确替代了错误,革新替代了守旧。然具有长年研究经验的人,都明白见过错误替代正确、守旧替代革新的情况。所以分析框架的变化,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常态。

二、证据组织的逻辑

在政治社会学分析中,运用什么框架处理资料,比起从现实资料转向历史资料,是更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资料是当今的或是历史的没有关系,因为它们的真正作用都是论据,是产出论(知识)的据(根据)。证据需要通过逻辑进行组织,分析框架不同,学者从史料中看到(或者他们认为值得重视)的东西往往不同。我们经常可见,针对同一史料,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不同的论点,这些差别,不完全是材料本身,而是研究者的分析框架决定的。这提示了,对社会转型分析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不仅仅是史料,还有来自经验现实、但经过人类认识活动抽象出的分析框架。是这些分析框架影响着研究者对于具体证据的组织逻辑。

比如,对于资本主义转型的分析,一种分析框架是: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从而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演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转型之根本;另一种分析框架则是,产权关系确定,激励了效率追求行为,于是生产剩余转向投资增加,导致生产力的更新,因此,产权关系的变化是转型之根本。那么,究竟是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转型,还是产权关系推动了社会转型?与其说是史料本身,不如说是分析框架对于史料的逻辑组织给出的答案。

还比如,“冲击—回应”框架,将社会转型看成是回应外部挑战的方式及结果,在这样的框架下,没有真正遭遇外部挑战的中国,似乎难以发生自动转型,因为不存在动力。如果如此,凡是和西方没有明显联系的史实都是不重要的,西方的冲击或影响,成了历史叙说中被凸显的重点。[①]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则相信内因是变化的依据,转型必定始发于中国自身的需要和情势。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和西方无影响关联的历史事实,对于转型解释的重要性自然上升。中国自身是否会发生转型的动力?这些动力是什么?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冲突、其作用究竟是巩固了延续还是触发了转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和分析框架密切相关。

这两个例子,提供了对于转型基础原因的不同(甚至相反)看法,是运用分析框架选择史料、并组织化史料中的关键要素关系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何者为转型的关键要素,并非由史料自动给出,而是由分析者从史料中选出。因而,选择什么,忽略什么,如何将选择的证据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起来并指向结论,无论研究者自己是否明确认识到,实际上都需要运用分析框架的指引。

三、提问方向

由于分析框架是一项将关键要素关系理论化的努力,学者很多关于历史事实的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分析框架的分歧导致。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不同“理论”引导并回答提问的结果。分析框架不同,意味着背后学术传统的理论所提供的理由不同,研究提问总是走向理由,所以提问的方向不同。在不同目标问题的引导下,基于分析框架的强调或者忽略,在转型研究中十分常见。

比如基于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对于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它们的现代性生长为何遇到障碍?是什么障碍?此提问的基本逻辑在于——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偏离了(现代化设置的)标准?基于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市

①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序言,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4 页。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2 页。

场体制会在中国出现? 在仍然由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型经济中,是什么制度“允许民营经济行动者与之展开竞争与合作”?①此提问的基本逻辑是——(本不应有,但)为什么有……? 这些问题逻辑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不同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重点就是选择点,面对大量的资料,确定何者更为基本和重要,在不同框架的影响下,实际上不得不存在必要的彰显和忽略。

这一点在社会学分析中尤其明显。由于社会学对于转型分析的目标不仅在于阐述过程,还在于说明转型发生的动力、机制和形态,社会学对历史资料的处理,关注点就不仅是事实记录——故事、阶段、成败、人物命运、甚至单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群体行为的动力来源、及其和规则(制度)演变之间互相构造的关系,还有,描述它们的“结构生成”——社会学的语言叫作机制——的变化。

社会学把新结构关系的形成视为转型。从这一立场出发,显然不是所有冲突与变化都具有转型的意义。在社会学的转型分析看来,并非所有的活动都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人类活动,结果不过是在延续或重复社会和文化结构②,并未带来显著和有意义的变化。所以,转型的意义是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赋予的。转型的证据素材当然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但挖掘证据素材的研究者同样重要:他需要区分无关紧要的日常活动,与改变或者延续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系统化力量,区分长时态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变化的关键时刻,区分个人关系与社会关系、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个人思想与社会观念、人际间的远近关系与社会势力分布的格局、偶然变化与必然变化、不可能出现与尚未出现的变迁,真正的前进与循环往复……也可以说,研究者需要把撼动社会结构的变化,从纷繁的一般变化中辨识出来。这些区分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果,没有分析框架的处理,它们就混杂于历史资料中难以显现。

四、对材料价值的敏感

选择和区分需要辨明,究竟哪些是显著和有意义的变化。比如对于经济转型分析,为何民营经济的出现对于转型十分重要? 为何多元组织类别的出现有意义? 为何新的经济行动者加入是不能忽略的主题? 对于这些要素的价值评估,需要事实的证明,也需要分析框架发挥标准设定的作用。学者实际上依赖它挑选和组织他们认为是重要的材料。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面对同样材料时,不同的分析者会“发现”不同的东西。哪些令其敏感,哪些值得深挖,哪些可以忽略,需要依赖分析框架做出选择。在生产力推动的框架下,分析者势必注意有关生产力进展的事实,在产权关系推动的框架下,分析者肯定不会忽略任何正式或私下(非正式)的产权规则的改变。很多转型的材料是在特定分析框架下发现的,没有分析框架,就无法敏感到它们的重要性。比如,只有运用“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发现”社会行为规则中,不同于传统关系的现代性要素。如果不使用这一框架,就不会觉得这些所谓的“现代性要素”有多么了不得,因为在延续性的框架中,它们不过是传统的自我生长而已,并不具有推动社会转型的革命性价值。所以,对于拒绝这一分析框架的研究者来说,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根本不能成立,理由是它不是社会事实的转型,而是分析框架带来的结果。

分析框架可以帮助转型分析注意并高度重视一些现象,暂时忽略另一些现象。人们运用分析框架对资料的价值进行评估,对资料的逻辑关联进行组织,筛选或产出核心的分析概念。比如,韩国多数信众为何从本土的信仰体系、“转型”为信仰外来的基督教体系? 以地缘政治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就会十分重视韩日历史关系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基督教在其中的角色,把这些而非别

① 倪志伟、欧索菲:《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 页。

② 理查德·拉赫曼:《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的史实和影响,看作关键转折的动力因素。① 运用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学者发现了上述特定的历史活动对于信仰转型的作用:它们消除了外来信仰体系的文化及政治威胁性,是基督教成功获取信众、导致广泛信仰转型的社会原因。在缺乏特定分析框架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能记录、但无法分析,也许能看到平常,但看不到变革,也许能看到冲突,但无法辨别哪些冲突对于后来的转型具有关键性意义。

五、分析工具

不少学者对分析框架担心,他们拒绝脱离具体经验的理想类型引导,理由是分析框架有形式逻辑之嫌,它不能也不应替代丰富多变的实际。这是一个棘手问题。但,研究工作是否可以、或者应该免除分析工具? 我十分怀疑。

作为一种抽象化的认识手段,分析工具通常由核心概念或者一组概念关系组成。没有这种工具,基本上,转型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描述,无法进入事实间关系的分析。分析必须依赖概括和抽象。比如,角色是一种抽象,群体是一种抽象,行动者是一种抽象,掮客是一种抽象,法人是一种抽象,组织是一种抽象,它们是对处于某种关联、发挥某类作用的群体行为的特征概括,我们在经验中看不到它们,看到的只是张三、李家、父亲、三舅……但可以通过分析看见他们:角色、群体、行动者、掮客、法人和组织确实存在。没有它们,转型就只能见诸个人,无法分析公共社会,或者只能见诸个人动机,无法分析系统化行为。还比如对制度的分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它们都已经高度抽象,作为分析工具用于概括一类差异性的社会特征。作为通识性知识,学者在运用它们的时候,不必每次都再给出定义。没有这些抽象概念指涉的特征,转型分析甚至连基本的类别区分、差异比较也无法做到。更重要的,关于条件和结果,动机和行动的区分,也属于脱离某一经验的形式类型。在面对具体材料时,没有这些分析工具,我们如何判断哪些社会事实属于条件,哪些是结果,哪些是动机,哪些是行动?

转型研究与结构分析具有内在的亲和力。在某种意义上,社会转型甚至就是一个结构分析术语。结构具有类型差异是一项社会科学的看法,基于这种看法,“转型”意味着出现了不同于原来结构的新角色、新组织、新关系的形态。这些形态如果概括为知识产品,确实暂时脱离了具体的经验,类似于哲学由特殊到一般的抽象。但是,“结构的隐喻意味着稳定,结构只能解释社会生活怎样变为与之协调的组成部分,而对这些部分如何变革不予讨论。结构论往往认为,变化在结构之外,例如历史中的终结、衰落的观念,是施予系统外部的影响。当谈论从有关稳定的问题转向变迁问题时,往往涉及棘手的认识论转向。②

认识论转向,就是改变分析框架,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学者区分不同社会类型的时候,必须依赖潜在的逻辑标准,这些标准实际上是分析框架给予的。于是,可以理解地,会有这样的疑惑产生:怎么能用先入为主的框架关照事实本身? 为何非要用形式结构“剪裁”经验史实? 这不是把它们强制“组成”别的模样吗? 这些所谓抽象的结构是社会的真实吗?

不幸的是,如果没有分析框架,确实就看不见一些社会真实。就像医生借助了一台显微镜,没有显微镜,看不到现象背后的纹路关系。同样,没有分析工具,学者的认识活动就难以发现一类特征与另一类特征的差异,无法辨别材料之间的作用和关系。社会转型是带有确定目标的认识过程,它借助分析框架辨明意义。社会上大量的冲突不具差异类别的意义,但有些冲突具有转型的意义,因为不同的原则出现,如何辨别它们,依赖的是新要素引入了分析框架。它赋予了历史事件的转型意义:新的行事原则出现。

举例法律史上的一件事。有一条河流,河流的周边有很多先在地主,他们世代都是周边土地的主人。随着电力设施的发展,需要利用河流建

① Danielle Kane,“The Puzzle of Korean Christianity Geopolitical Networks and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East Asia*, AJS,Vol 115 No 2, September 2009, pp. 365-404.

② 威廉.H·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 年版,第 122 页。

一个发电站。发电站造了水坝,导致下游周边的土地产量下降,人们发现原因是有了水坝后,有些季节走向下游的水流减少了。于是下游的地主起诉电站开发商侵犯了他们的产权,要求对方拆除或者补偿。这个诉讼的判决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法官引入了新原则,他要求双方——土地所有者和电站运营者各自拿出证据,比较谁的资产使得社会获益面更广,谁能带来更大的公共受益性。结果是电站赢了,因为发电使更多的产业使用上电,包括周边地主的土地灌溉获得了新能源。人们广泛从中受益,但是土地所有者的粮食产出,受益面没有电站带来的多。

为何这个案例在转型分析中有意义? 因为它启动了新的行事规则:改变了历史上——以先来后到为据提供法律保护的逻辑。从时间衡量到加入受益面比较,法官引进了一个新的行为标准:当两个产权人具有冲突的主张时,法律面临选择——保护在先的产权还是新到的产权。此时,具有更大公共受益面的产权得到保护,等于确立私人产权和公共利益的结合规则。试想,如果没有区别于特定利益(个人或家户)的公共利益或共享利益,作为新的分析工具引入,法官的认识不会发生改变,这一行事规则的“转型”也难以出现。

六、形式逻辑

上述情况表明,隐藏在分析框架中的形式逻辑——比如公共利益和家户利益的区分,成为一种可以独立于特定材料的先验标准,必不可少。人类向未知前进需要借助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的先验性构想作用,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自身的历史经验,对某些前提性的问题进行设问。

没有形式逻辑,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就变得更困难:“在(某)些文明中,对本体性现实的基本定义,和强烈的推行超验愿景模式的彼岸世界观念,没有像在欧洲、或者一定程度上像伊斯兰那样,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替代性观念,以及从原则上按照根本上先验的取向,对政治(或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进行重建(的力量)。”①

没有形式逻辑,人们难以运用特征或者性质这类抽象的类别定义,形成不同于自然时间的分析时间——比如传统与现代;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空间的分析类别——比如国家与社会;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经济的分析形态——比如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统治的分析形态——帝国与民族国家。显然,如果没有形式逻辑的帮助,这些差异之间的转型就会隐藏于历史视而不见。

没有形式逻辑,人们更难以揭示客观事实背后的因果联动机制,因为这种揭示必须有观念架构的参与——让叙事摆脱单纯的编年顺序,服从分析框架设定的解释顺序:“机制探索要求对事实的叙述,服务于对关键时序动因的挖掘。比如,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历史的叙述,就服务于他对法国社会关键局限条件的发掘:绝对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观念的抽象性、和政治经验的匮乏。他使用史实是为了揭示这些关键变量、(及其)在塑造革命具体进程中的持续和变化作用,而不是为了书写史实本身。可以说,他摒弃了编年的秩序,让叙事服从于观念的秩序”。②

当然,形式逻辑既给予研究者自由,又给予他们认识限制。而突破限制依赖新的分析框架和事实资料,因此,转型研究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学习及合作提供了难得的空间。

七、适用性标准

既然转型研究离不开分析框架,分析框架又是多元竞争的,那么一个棘手问题必然出现:哪些分析框架是适用的? 根据什么判断它的适用性?

一个流行的标准是国家差别。这个问题目前的争议,焦点主要在政治方面。但政治问题和知识问题存在差别:政治有国界,知识是跨国界传播的,政治事关(话语)控制权,知识的扩散则不在于生产者或生产地,而在于受众的选择。知识一旦产出,就被看成是公共可用的,可以用它地的经

① 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6 页。

② 马嘉鸿:《〈旧制度与大革命〉究竟说了些什么?》,王涛主编:《托克维尔与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第十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验证实或者证伪的。知识作为一套解释系统,既可以被政治性使用,也可以被知识性使用。政治性使用关注话语控制权问题,适用性的标准就成了国界:产生于 A 地的分析框架不适用于 B 地,指 A 地的知识不应对 B 地形成话语控制。

知识性地使用则是另一番景象。比如,前述提及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并不是产生于韩国,但是否适用于韩国信仰体系转型的分析?还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也不是产生于中国,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分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一项知识系统,从知识的角度看合理,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是为错误?或者反过来,一个话语体系,从政治的角度看合理,但从知识角度看是为谬误?这些问题纯粹从单一的立场出发得不出全面答案。但有一途径也许可以使棘手变得简单:看其是否能解释实际事实,有多大程度的解释概率。如果不能解释,无论它来自哪里(即便是本地)都是不适用的。即使从政治角度考量,一个解释力低的话语系统,也无法赢得真正的控制权地位。

比如,有研究者发现,早在经济转型发生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国全民所有的低技术企业中,就存在着一种混合式的工资体系。在 1952 年及 1956 年的两次工资改革中,计件工资都被认为是先进的工资方式,得到推广。经过 1956 年运动式推行之后,国务院统计的工厂计件工资率已经超过 45%。不过,这种推广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不久以后,计件工资就作为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成为大跃进时期的批判目标。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中,计件工资减少了,甚至(至少在名义上)被完全取消。但在大跃进后期,不少工厂又恢复了计件工资制。而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写道,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如果计件工资制与资本主义相关联,为什么这种工资形式,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推行?①

这个问题对转型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有关资本主义分析框架提供的标准特征在新环境下的不适用,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和政治意识形态互动时发生的摇摆现象,有助于理解社会变革的发生、以及之后的政经关系走向。如果这项制度安排在变革发生前就具有长期历史,就可能解释变革中经济双轨制、甚至一国两制思想的由来,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四十年以来的国企改革进程,为何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容易,一系列市场规则的出现,为何没有激发强大的阶级反对力量出现,以及比较而言,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何基本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的社会转型分析中,即使是最强劲流行的分析框架,也不得不在新的事实面前发生变动,这是知识更新的内在动力所为。比如,传统落后解释不了亚洲的飞跃性发展,现代化无法解释拉美社会产生依附结构的事实,威权体系难以解释体制在变革中的韧性,制度滞后难以解释意识形态名实分离下的发展现象,民主选举难以解释公共品提供的差异……在面对一系列新现象时,努力寻找或者建立适用性更高、更严谨的分析框架,是所有转型研究者的工作。但所有修正或替代性的新框架,都不得不接受来自他国经验事实的检验,这意味着任何分析框架都不是特指或专用的,自我限定适用区域或者排斥外来分析框架,不仅对他人的影响更少,而且还阻止了自己的进步。

对分析框架适用标准的另一个疑问,来自古今差别:当我们面对历史材料时,这个分析框架是否是史人的?确实经常不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观念。古人的看法不可能是今人的看法,古人重视的问题不一定是今人重视的问题,古今运用的概念、概念中的含义都不一样。对于古人而言,教育是教化而非求知;治国重安而非富强;社会重位序差等而非平等;家庭重责任伦理而非个人权利;财富重土地房产而非流动金融;战争重输赢而非正当;国家重疆土拓展而非政治关系的制度化;女性重家庭隶属和保护而非独立……对于这样的历史材料,用今人的眼光、框架、概念和标准来提问是否适当?如果结论是不适当,那么转型研究何以进行?如何才能对历史提供新认识?

对此我没有答案,只是提出问题。

① 张博伦:《计件工资制度研究计划》,2018 年 8 月。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Zhang J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note discusse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similar to the ideal type of formal logic. It is an effort made to theorize the key element relationship and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multi-faceted and competitive, representing the tradition of a school of thought. The size of analytical frameworks actually indicates the size of standard logics. These logics often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s of specific facts on the part of the researchers, and play a role in discovering facts, assessing value, providing standards, and organizing evidence in transformational research. Without the help of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transformation among various features will be hidden in history. It is because the judgment of which is the key elem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is not automatically made by historical materials, but by the analysts' selection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mal logic

(责任编辑　　管　琴)